

# 費隱(Xavier-Ehrenbert Fridelli)

## 長眠在北京的中奧文化交流使者

余三樂\*

在中國幾千年的古代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很長一個時期，中國曾創造了足令全世界為之贊嘆的高度的文明，科學技術也曾經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然而古代的中國又是近乎封閉的社會。西部的高山、東部的大海、北部的荒漠，在交通和通訊不發達的古代，幾乎把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完全隔絕了。在中國漫長的古代史中，與外部文明的大規模交流僅僅有兩次：一次是東漢時期傳入的印度文明；一次是明末清初傳入的歐洲文明，或稱西方文明。而這第二次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是一批博學多才的耶穌會傳教士，1705年來華的奧地利耶穌會士費隱(Xavier-Ehrenbert Fridelli)就是其中傑出的一員。

### 耶穌會士與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

自從15世紀的大發現時代以來，被《馬可·波羅行紀》激發了無限夢想的歐洲商人們，和抱嫉歸化一切東方異教徒的狂熱情緒的傳教士們，紛紛來到中國的大門口。但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被檔在一道無形的萬里長城之下，而一籌莫展。

美國學者鄧恩(G. H. Dunne)說的對，“中國曾經有過高度探險和激動人心的冒險時代。在漢朝(206 B. C. -220 A. D.)的偉大的漢武帝(140-87 B. C.)統治下，亞洲的土地就已經回響著中國軍隊征服的腳步聲，偉大的先驅者們的探險歷程深入到中亞地區，與地中海文化的邊緣地帶建立了接觸。在盛唐的黃金時代，都城長安(即現在的西安)，曾是整個東方的麥加。當時，她的文化的光輝照亮了東方，她的影響波及周圍各國。基督教的聶斯托里教派(中國稱為“景教”)受到了友好的歡迎。伊斯蘭教和摩爾教也被寬容和接納。佛教繼續帶給

中國以外部世界的新鮮思想的溪流。在元朝統治期間(1279-1368)，當忽必烈的繼承者們在中國南面而王時，在‘汗八里’(即後來的北京)塵土飛揚的街道上，外國人的面孔是很平常的景觀。”可時，“這樣的光榮日子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了……16世紀的中國，已經衰老了……沒有冒險和進取的精神了。除了最初的兩位統治者……明太祖和明成祖(1368-1424)之外，明朝已經不是一個生氣勃勃的王朝了。中國文化是位老人了，她仍然生活在過去，做著老人所習慣做的事。這是一個社會停止的標誌。”<sup>(1)</sup>

如果用動物胚胎的受精過程來作比喻的話，閉關自守的中國就好像有一層堅固保護膜的卵子。而包圍在四周的眾多精子之中，僅有少數(如果不止一個的話)佼佼者，才能進入其中，與卵子結合，從而孕育出一個嶄新的生命來。而耶穌會就是當時的佼佼者。它藉以進入中國社會的優勢條件有兩點：一是它成功的教育制度所培育出的一大批博學多才的教士；二是它靈活而富有彈性的傳教方針，

\* 余三樂，北京行政學院國際交流合作部項目主任，副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利瑪竇分會執行主席兼秘書長。

即“文化適應”政策。

1534年，一個出身於西班牙貴族的依納爵·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邀集一班志同道合者，做做軍隊的組織和紀律，建立了稱為“耶穌會”的宗教團體，並親任第一任總會長。耶穌會以“天主教會復興者”自居，為其成員規定了旨在維護教皇和天主教利益的種種任務，其中包括：廣泛興辦各種學校，吸收自然科學研究的新成果，以便使天主教會的科技進步的形勢下得以生存和發展：向諸如美洲、印度、中國等海外各地積極傳教，等等。

重視教育是耶穌會的一個重要的特點，也是一個突出的優點。耶穌會採用了先進的近代教育體系，吸引了歐洲各地的年輕人在它的學校裡學習。“由於通曉古代和近代的知識且有良好的學術素養，耶穌會士通常是歐洲最有才華的人。”<sup>(2)</sup>引人注目的是，在耶穌會的學校裡，大量的課程，甚至可以說主要的課程，是非宗教性質的。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在其著作中披露了耶穌會學校的課程設置：

課程設置的主要新穎性在於系統學習自希臘、羅馬以降的非基督教哲學家 and 作家的著作。耶穌會的教育有三年時間是學習人文主義的，一年時間學習人類學（Humanitas），兩年時間學習修辭學（Rhetorica）。經過兩年充滿靈性的見習期，開始學習哲學。第一年專攻邏輯學，尤其關注“共相”和認識問題。然後學習物理學，物理學主要研究物質和自然力，但也研究抽象形式的性質，以此為學習數學做好準備。在學習物理學時，學習計劃規定每天花一小時學習歐几里德的《幾何原本》，然後開始學習地理學、製圖學、天文學和機械學。課程設置中也包含了實踐活動，如製造日晷儀、星盤、時鐘和天體圖……<sup>(3)</sup>

祇有通過幾年時間學習其他學科之後，才開始學神學。

會長依納爵·羅耀拉的這一辦學方針出於三方

面的考慮：首先，他認為這些學科是研究聖經所必需的；其次，要在文藝復興時期的高級知識份子中具備競爭力，以及通過人文科學的文化中傳播信仰；再次，他也承認非基督教經典對於人的成長和倫理教導具有價值。總之，他認為神學不是出發點而是抵達的終點，祇有經過長長的思想之旅之後，神學才能臻於完善。

羅耀拉於1551年創建了羅馬學院，延攬了許多優秀的教師，伽利略也是該學院的客座教授。羅馬學院一度成為世界最先進的科學研究中心。很多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諸如：利瑪竇（Matteo Ricci）、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艾儒略（Giulio Aleni）、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等等，都是羅馬學院的畢業生。除了羅馬學院之外，在當時歐洲的很多國家都有耶穌會的各種不同的學校。

耶穌會創辦的教育事業是非常成功的。它不僅培養出眾多為傳播福音而獻身的忠誠的傳教士，也造就了學富五車的學者和科學家，正是迎合了中國一批開明的文人對科學的渴望，和中國朝廷對觀天、修曆和造炮等西方科學的需要，十字架才有可能跨越過那道無形的萬里長城。

與天主教的其他修會相比較，耶穌會的第二個優勢是它的“文化適應”政策。讓我們再引用鄧恩的一段話：

這個修會是由教皇保羅三世於1540年9月27日正式批准的年輕的修會。宗教的修會，就像一個人一樣，通常在它的年輕時期比較能夠顯示出它的適應性和靈活性，而這種適應性和靈活性在它年老時則比較欠缺。隨着年齡的增長，就越來越小心謹慎：偏愛走老路；不願意承認世界從來不是靜止的和永恆不變的，而以往的規律常常是會過時和變成錯誤的；不願去嚐試新的冒險。

耶穌會的創始人聖·依那爵不懼怕開闢新路。他制定的修會規則，對他的追隨者的傳教方式不做狹隘嚴格的限定。相反，他決定對耶

耶穌會的成員採取與眾不同的做法。修會首要的規則之一就是要求他的成員必須學會其所在國的語言。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但作為文化適應的首要法則卻往往被忽視了。在當時外國借助翻譯來講授教義成為通常的慣例。<sup>(4)</sup>

根據這一文化適應的方針，利瑪竇等人學習漢語，身著儒衣，對中國的傳統禮儀（祭祖、祭孔等）採取了兼容並蓄的態度。

就是憑藉這兩大優勢，這顆精子穿透了卵子的保護膜。耶穌會士們不但在中國站住了腳，還進入了帝國的都城北京城。在差不多整個康熙年間開創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黃金時代，把北京這個封閉帝國的封閉的都城變成中國版圖上（除澳門以外）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數以百計的西方人來到這裡，生活在這裡，甚至死在這裡，安葬在這裡；大量的西方圖書運到這裡，藏在這裡，其中一部份在這裡翻譯出版，涉及天文學、曆法、數學、地理學、物理學、機械學、建築學、動植物學、人體科學、醫藥學、心理學以及音樂、美術等等方面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當然還有宗教文化）在這裡傳播，或通過這裡向其他地區擴散。一幕又一幕中西文化交流與碰撞的生動活劇，在這裡演出，雖經幾起幾落，卻一直延續了兩個世紀。

本文的主人公——奧地利籍的耶穌會士費隱，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於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來到中國的。

1673年，費隱出生於奧國的林茨（Linz），十五歲進入修院，獻身宗教。1690年前後，曾在北京任欽天監監正的葡籍耶穌會士閔明我（Philippe Marie Grimaldi）奉康熙皇帝之命出使歐洲數國，在德國逗留甚久。就是受了他的影響，費隱萌發了到中國的理想，“請赴東方，獲許可。海行頗經風浪，1704年末抵果阿，次年8月8日抵澳門”<sup>(5)</sup>。到中國後，他根據《中庸》中“君子之道費爾隱”的名句，又取了他原家族姓氏的第一個發音，起了中國名字——費隱，並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取了姓名之外的“字”——存誠。這時閔明我已先期回到中國，

任耶穌會中國—日本巡察使。閔明我命費隱到鎮江傳教。朝廷得知費隱學識淵博，且通曉數學，便召之進京，參與測繪大清帝國版圖的工作。從此，令費隱名垂史冊的事業就開始了。

### 費隱與《皇輿全覽圖》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的領域就是地理學。正如美國舊金山大學中西歷史文化研究所的福斯（T. N. Foss）先生所說的，“首批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就把繪製中華帝國的地圖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對待。他們把自己積累的製圖材料用於啟發中國人，並滿足其同外部世界關係中的好奇心。……從在華耶穌會傳教士的早期活動到18世紀後期被鎮壓為止，繪製地圖都被看成是耶穌會士、會友同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的中國同事們的一個合作項目。耶穌會士們為擴大傳教規模為朝廷响勞，同時也滿足了西方學者對中國情報的渴求。”<sup>(6)</sup>中國史學家方豪先生評論道：“明末中國天主教人士，在科學上作了一件集體大工程，那就是崇禎年間的修曆；清初中國天主教人士，在科學上也完成了一件規模更大、在科學上成績也更卓越的偉業，那就是康熙年間的測繪全國地圖。”<sup>(7)</sup>此即測繪《皇輿全覽圖》的宏偉的工程。

費隱於1709年至1718年之間以極大的精力投身於這項事業之中，走遍神州大地東南西北的半數省份。

向中國人介紹西方的地理知識，是從利瑪竇開始的。他繪製的包括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地圖，曾令中國人大開眼界。第一個用西洋測繪方法來測繪中國地圖的也是利瑪竇。他從南到北地縱貫了當時明王朝版圖的東部，測定了沿途城市的經緯度。1601年之後他所印製的世界地圖的中國部份，都是根據他的實際測量和參考了中國文獻資料而繪製的。

利瑪竇的後來人——耶穌會士湯若望（德國人）、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比利時人）等都對中國的一些城市的經緯度做過測量；衛匡國

(意大利人)、卜彌格(Michel Borm, 波蘭人)、和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比利時人)都分別繪製過中國地圖。但是, 個別的傳教士顯然不可能對中國遼闊的國土進行普遍的實在測量, 他們還是大量地依靠中國的輿圖和地方志。而直到1687年首批法國官方傳教團來華, 用西洋測繪法的繪製全中國地圖的計劃才得以實現。

在當時的歐洲, 法國的首都巴黎成了西方世界測繪地圖的中心。1679年, 意大利出生的天文學家和地理學家卡西尼, 即曾大力主張派人到東方進行觀測的法國天文臺臺長, 製定了一個龐大的為世界重新繪圖的計劃。第一批來華的法國傳教士裡, 有幾名就是因為受過專門的地理學培訓而被選中的。當這些法國傳教士來到中國, 遇到了雄才偉略的康熙皇帝之後不久, 就發生了被福斯先生稱為“在耶穌會士繪製中國地圖的歷史中一個令人興奮的故事”, 即在18世紀的頭二十年中, “康熙皇帝親自提出的一個計劃, 命令在華傳教士對全國進行實際測繪並在此基礎上編製一幅地圖。該地圖後來在中國和歐洲出版了, 為中外提供了有史以來最精確的中國地圖, 這幅圖一直用到19世紀中葉。”<sup>(8)</sup>

康熙皇帝關於測繪全國地圖的設想, 首先萌發於平定三藩之亂時。在戰爭中地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也暴露出很多缺陷。有些地圖粗略模糊, 有的含混不清, 有的甚至錯誤百出。據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研究, 是法國傳教士張誠(Jean François Gerbillon)提出的建議, 使康熙進一步認識到測繪新地圖的重要性。張誠在參加尼布楚(Nerchinsk)條約談判時, 曾痛感中國對東北地區的地理情況不清給國防和外交造成的困難, 於是向康熙建議組織一次全國性的大地測量。康熙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議。

最初, 包括有溫榆河在內的北京附近的幾條河流, 周期性地泛濫, 使皇帝感到有必要對京畿地區搞一次詳細的調查。1700年他命白晉(Joachim Bouvet)、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和安多(Antoine Thomas)去完成這項任務。七天之後, 第一份地圖

呈到皇上的几案上, 皇上對此十分滿意。1708年, 皇上命雷孝思、白晉、杜德美(Pierre Jartoux)三人測繪萬里長城的位置, 以及附近河道。第二年, 他們返回北京, 帶回一張約15英尺長的地圖, 上面繪有河流、要塞和三百多個關口的精確位置。皇上高度評價了這些洋人的工作, 他感到對帝國的疆域更加心中有數了。

1709年5月8日, 剛到北京不久的費隱, 奉旨加入雷孝思等的行列, 測繪東三省地圖。他們跨越長城, 測繪滿洲西部、奉天、朝鮮北部、圖門江與鴨綠江, 即北緯40度至45度一帶。當然, 任務是極其艱鉅的, 在那荒無人煙的地方要找到必需的人力、馬匹和糧草都很困難。但皇上早有先見之明, 他頒佈聖旨, 令所到各地的文武官員對繪圖者給以全力支持, 才使該項工作進展得順利。這些奉旨繪圖的傳教士, 當時被中國的官員們稱作“欽差大人”、“使者”和“西洋大人”等等。

至於他們所使用的方法, 方豪先生說: “《皇輿全覽圖》的主要工作, 是測定全國的三角網和經緯度; 但受儀器的限制, 少數部份用天文測量, 大部份仍用繩丈辦法: 所謂天文測量, 即觀測太陽及月食, 與木星等。丈量時用劃一尺度, 並用測鏡測定坡度, 對準方向; 先量定準確的基礎, 再用三角法遞推互校, 由近而遠; 更由已知之處加以反測。”<sup>(9)</sup>

待他們完成任務回京後, 康熙又派他們測繪北直隸各地。1710年7月22日, 康熙又派遣費隱、雷孝思、杜德美三人往黑龍江一帶繪圖。同年12月14日, 費隱一行凱旋。康熙皇帝見地圖測繪得十分精密, 大喜。1711年, 皇帝將傳教士分為幾個組, 齊頭並進, 加快速度。費隱、杜德美、白晉和山遙瞻(Guillaume Bonjour Fabre)等測繪長城西部, 即晉、陝、甘等省及以遠直達哈密的廣大地區。雷孝思與新到中國的葡萄牙籍數學家麥大成(Jean-François Cardoso)奉命到山東。這年底, 又有馮秉正(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s)、湯尚賢(Pierre Vincent de Tartre)等人投入這一工作。

1712年，更多的傳教士奉命分赴全國各地進行大地測量，繪製地圖。馮秉正、德瑪諾（Romin Hinderer）、雷孝思三人赴河南、江南、浙江、福建等地。1713年，費隱、山遙瞻二人赴雲南、四川、貴州；湯尚賢、麥大成二人赴江西、廣東、廣西。1714年馮秉正、德瑪諾、雷孝思三人測繪臺灣西部地圖。山遙瞻在雲南因勞累過度，又為瘴氣所襲，一病不起，竟在邊境地區以身殉職。在貴州的費隱也染病倒下。翌年雷孝思前往雲南、貴州。費隱病癒後，與雷孝思共同完成雲貴及湖廣等省的測繪工作。巴多明也到沈陽、旅順及山東半島進行實地測量，並繪製成圖。一名來自斯洛文尼亞的耶穌會士劉松齡（August Von Hallerstein）云：“（費）隱自北而南，歷地甚廣，測繪之餘，兼傳布教務。”<sup>(10)</sup>

總之，整個工程花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1717年，這些中西測繪人員完成了各自的任務後，聚集在北京。此外，皇上還派兩名在北京蒙養齋跟隨傳教士學習過測算的藏族喇嘛奔赴西寧、拉薩等地測繪地圖；朝鮮國又提供了朝鮮地圖。這些圖經費隱、雷孝思、白晉、杜德美等人重新審定，終於集成包括中原各省、滿洲、西藏及朝鮮的全國總圖。經過中外人士又一年的辛勤勞動，於1718年製成《皇輿全覽圖》和各省分圖稿共三十二幅，並刻印成冊。康熙對這項醞釀多年的夙願得以成功，十分欣慰。他對臣下說：“《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sup>(11)</sup>專家評論說，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廣闊的國土上完成的全國性測量。“當時歐洲尚未舉行如此規模大的測量；且雷孝思與杜德美由發現經度長上下不同，證實了地球為扁圓形，亦為世界地理學上一大貢獻。”<sup>(12)</sup>

《皇輿全覽圖》完成後，由馬國賢（Matteo Ripa）攜往歐洲，製成銅版四十一幅。“法國地理學家唐維爾（J. B. Bourguignon d'Anville）曾根據此圖做成《中國新圖》，在巴黎出版兩次，在荷蘭出版一次。又收入杜赫德（Du Halde）的《中華帝國全志》，共三十二葉。”<sup>(13)</sup>在中國，全圖分為二百六十圖於雍正四年收入《古今圖書集成》。1929

年，在沈陽故宮博物院發現三十二幅原圖，70年代在臺灣據原樣再版。

1723年，雍正皇帝即位，他又命令費隱和雷孝思測陝西裡海間地圖。皇帝“命來自錫爾河之喀爾木部官吏為向導，付以滿文路程及種種輿地文件，俾資參考。”<sup>(14)</sup>

為了完成中國皇帝交與的繪製地圖的任務，費隱北至黑龍江以外，西達哈密，南抵雲南，盡是人煙稀少的蠻荒之地。他的足跡遍及現今中國的十三個省份：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西、陝西、甘肅、內蒙、新疆、雲南、貴州、湖北、湖南等，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法國傳教士馮秉正稱“中國地圖與塞外地圖，並出於法國人之手，費隱神甫僅伴行而已。”<sup>(15)</sup>是不公正的。

《皇輿全覽圖》是中國第一次用西方先進的測繪方法繪製的全國地圖，是清代全盛時期的代表作，也是康熙皇帝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寫照。它的出現有妖歷史的必然性，這就是當時處於鼎盛時代的中國統治者需要一部真實地反映帝國全貌的綜合性的地圖，以便來管理分佈在廣袤國土上的各級地方政府，徵收賦稅，興修水利，防治水害，平息叛亂，維護朝廷對整個疆域的有效控制。同時它的出現也具有其偶然性，這就是剛好有在地理學方面受過專門訓練的包括費隱在內的一批西方傳教士來了中國。他們一方面抱有渴望瞭解中國的求知慾（這種求知慾不僅是個人的，也是那個時代整個西方世界的），同時也期望妖以他們報响朝廷的出色工作來換取傳播宗教的自由。為此，這些傳教士們風餐露宿，出沒於人跡罕至的地方，有的不幸以身殉職。他們為西方人瞭解中國，也為中國人更好地瞭解自己的國家，作出了不朽的貢獻。因此可以說，《皇輿全覽圖》是自利瑪竇以來一代又一代西方傳教士對中國地理狀況認識的集大成之作。即使到了今天，這部中國地圖也不失其現實意義，它可以雄辯地告訴世人，最起碼從康熙時代起，西藏地區已經納入中國的版圖，成為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領土，從而可以據此給中外分裂主義者迎頭痛擊。

誠然，他們繪製的地圖，在鴉片戰爭之後可能

掛在入侵中國的外國將軍的指揮部裡。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中國大陸的一些書籍裡，他們被稱為刺探中國情報的“帝國主義的文化特務”。但是不要忘記，他們是先把西方的情況介紹到中國來的，他們首先繪製的是包括了歐洲國家在內的世界地圖。難道能因此就說他們是“出賣”自己祖國情報的“特務”嗎？

再說，為甚麼近代的中國人沒能利用傳教士們畫的世界地圖去征服世界呢？14世紀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橫掃歐洲的時候，並沒有精確的歐洲地圖。可見地圖並不是戰爭勝敗的決定性因素。中國近代屈辱的歷史，應該從近代世界和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去尋找原因，而不應該歸罪於那些奉了皇帝的聖旨辛辛苦苦去測繪地圖的傳教士們。本文的主人公費隱，以及其他曾先後參與繪製中國地圖的傳教士們，他們的功績應該得到歷史的公正的記述與評價。

### 費隱與北京的聖若瑟教堂（東堂）

北京最早的天主教教堂是由利瑪竇建造的、位於宣武門內的主教座堂——東堂。清順治年間德國籍耶穌會士湯若望就住在南堂。後來意大利籍的利類思（Ludovico Buglio）和葡萄牙籍的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也來到北京。鑒於他們與湯若望不和，順治皇帝就於1651年另外賜地給他們蓋教堂，命名為聖若瑟教堂，也就是位於王府井的東堂。

費隱完成了測繪地圖的任務之後，回到北京，被任命為聖若瑟教堂的住所道長，管理東堂的教務。1720年，教堂因地震而倒塌。費隱得到奧地利皇帝斐迪南三世的贈款，主持重修聖若瑟堂。他請來自意大利的曾研習建築、雕刻有素的利博明（Fernando-Bonaventura Moggi）主持建設，請也是意大利人、著名的宮廷畫師郎世寧（Giusepp Castiglione）主持繪畫。工程歷時一年，於1721年7月24日竣工。當時到過羅馬的人這樣評價新的聖若瑟教堂：“堂中大壇與羅馬聖路易教堂大壇極類似。其圓頂，繪畫悉用透視法，來堂瞻視之滿、漢訪客，莫不驚羨。有奧斯定會士二人來自羅馬，以

為置此堂於羅馬，亦無愧色。”<sup>（16）</sup>

關於東堂的記載，中國史料比較少見，就連在乾隆三十年（1765）編纂成書的堪稱當時北京歷史地理之集大成者《日下舊聞考》中，都沒有論及聖若瑟教堂。然而，在匯集了當時來京的朝鮮人撰寫的遊記雜文的《燕行錄》中，卻找到了朝鮮人洪大容記述聖若瑟教堂的一則史料〈東天主堂〉，頗為珍貴，現錄於此：

天主堂有四，南北未聞。西〔堂〕<sup>（17）</sup>劉〔松齡〕鮑〔友管〕所居，東堂雖不及西堂，遊觀者或往焉。

正月二十四日，由蒙古館過北玉橋，循宮牆而北百餘步，折而東，出大路，又北行里許，復折而東百餘步，道南見屋麓〔屋頂〕怪奇，可知其為西制也。

守者王姓，連山驛人，自言朝鮮人累主其家，是以見朝鮮人如故人云。歡迎無難色，亦不索面皮〔好處費〕。

入堂，其器物之奢，遜於西堂，而壁畫之神巧過之。北壁亦有天主像，毛髮森森如生人，前有兩人立侍。始入門，望見半壁設彩龕，安三塑像，心異之，以為塑像之妙非佛家所及。及至其下而摸之，則非龕非塑，乃壁畫也。西壁畫天主遺事，有新死小兒橫置於館上，少婦掩面而啼，其旁四五人環伏而哭之，乍見措愕卻立不忍，真畫妖也。

堂有自鳴鐘樓，與西堂皇之製大同。樓下有日晷石一雙。西出門，有數丈之臺，曰觀星臺。上建三屋，中屋藏各種儀器，門鎖不可開，穴窗而窺之，略見渾儀、遠鏡等諸器而不可詳也。屋之南，通穴至檐，廣數寸，掩以銅瓦如其長，每夜測候，啟而窺中星。云臺下庭廣十數畝，築磚為柱，長丈餘，上有十字通穴，遍廷無慮百數。蓋春夏上施竹木務葡萄架，柱旁往往聚土如墳者，葡萄之收藏也。

庭東有屋數間，中有井，井上設轆轤，旁拖橫齒木牙輪，平轉如磨。壁有柳罐數十，王

姓言春夏汲水以灌葡萄。機輪一轉，數十灑子鱗次上水，人不勞而水遍於溝坎，澆澆滿庭。每夏熟，濃翠厚蔭，如張重簾珠帳。秋熟，累累萬顆，實為都下勝賞。釀酒有西法，白烈絕異，其護養之勤，專為釀酒同云。(18)

此文述及壁畫、自鳴鐘樓、天文儀器、葡萄園和汲水器等西洋器物，堪稱是東堂情況的生動描繪。

洪大容的《湛軒燕記》成書於1765年，可見他所看到的東堂，即聖若瑟教堂是經費隱主持重修後不久的情況。洪大容特別稱，東堂的壁畫之神巧，超過宣武門教堂，栩栩如生，令人驚訝，“真畫妖也”，也恰恰是對郎世寧高超畫技的贊嘆。另有朝鮮人李宜顯、韓德厚於1732年訪門東堂，曾見到費隱本人，稱之為“天主堂主胡費姓人”、“守直人費姓者”，有時還親切地稱他為“西洋人費哥”。

聖若瑟教堂地處王府井、燈市口，是當時人們元宵節觀燈的地方。一首反映燈節的〈帝京踏燈詞〉就寫到了該教堂：

為掛紗燈搭小棚，遊人香各一支擎。  
粗豪緊踏秧歌去，卻把新衣向晚更。

酒家誰復換金貂，火樹空懸凍未消。  
風俗是誰改不了，元宵節各買元宵。

天主堂前任往回，風琴夜不響高臺。  
但聽無數秧歌鼓，打入人家屋裡來。(19)

詩中描寫了北京人看燈、買元宵的盛況，說元宵節之夜秧歌鑼鼓蓋過了天主堂的風琴聲，也從側面道出了平時教堂風琴鳴響的情形。

後來由於耶穌會被解散，1801年遣使會接管了聖若瑟教堂。先後發生的兩次火災焚燬了該教堂。1884年，東堂又在原址重建，1900年，在義和團運動中又一次被燬。1905年，該堂第三次重建。這就是現存的聖若瑟教堂，建築上面還刻有“1905”的字樣。

教堂的建築樣式雖然都是歐洲風格的，但也融

入了中國文化的因素。最為突出的是，常常用於中國古典建築中的楹聯，也被裝飾在聖若瑟教堂中。如：聖臺上聖若瑟懷抱聖嬰畫像的兩側，分別有：“病者之仰望”和“苦者之安慰”的對聯；聖臺前的柱子上，分別掛有“基督聖愛充滿人間”和“上主神光普照大地”的楹聯；還有“傾流寶血點點恩波”、“披示慈心焱焱愛火”，“我等奔爾臺前為我等祈”、“呼瑪利亞無原罪之始胎”等等。

1990年，聖若瑟教堂被確定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隨王府井大街的改造，這一具有悠久歷史的天主教堂又煥發了青春。如今教堂的圍牆被拆掉了，雄偉高大的建築顯露在來往行人的面前。白天，人們可以在教堂前的草地邊坐下小憩。夜幕降臨後，它在燈光中更顯得莊嚴肅穆。作為顯示西方文化特色的一處景觀，聖若瑟教堂已經融進了現代化的新北京之中。

### 費隱之死及其墓地的歷史變遷

1743年（乾隆八年）6月4日，辛勞一生的費隱神父得蒙主召寵，溘然去世，享年70歲。乾隆皇帝念他在華效力多年，雨雪風霜，功勞卓著，特賜帑銀200兩，將其安葬在滕公柵欄傳教士墓地。費隱碑文如下：

#### 耶穌會士費公之墓

費先生諱隱，號存誠，泰西熱爾瑪尼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於康熙四十八年庚寅入中國傳教。於康熙五十年辛卯欽召進京，內廷供奉。卒於乾隆八年癸亥閏四月十二日。蒙欽賜帑銀貳百兩。在會五十五年，享壽七十歲。(20)

滕公柵欄傳教士墓地位於北京城西阜成門外二里之遙的地方，最早是由萬曆皇帝於1611年破例賜予利瑪竇神父的墓地。隨後陸續去世的西方傳教士鄧玉函（Joann Terrenz，瑞士人）、羅雅各（Giacomo Rho，意大利人）、龍華民（Nicolao Longobardo，意大利人）、安文思（Gabriel de



(上圖與左上兩圖) 費隱曾經居住過並主持重修的聖若瑟教堂—東堂



位於北京行政學院校園內的西方傳教士碑林（居中者為費隱墓碑）

聖若瑟教堂院內的聖母像

Magalhães，葡萄牙人）、利類思(Ludovico Buglio，意大利人)等先後埋葬在利瑪竇墓前。德國傳教士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憑藉他與順治皇帝特別親密的私人關係，在利瑪竇墓地西側得到了一方屬於他自己的墓地，於是滕公柵欄墓地就擴大了一倍。康熙年間，來京的西方傳教士越來越多。他們(包括費隱在內)死後也埋在這裡，墓地也就逐漸地擴大了，附近還建起了教堂、孤兒院、醫院等附屬設施。

滕公柵欄傳教士墓地第一次被毀於發生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有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在列強發動的歷次侵略戰爭中連連敗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將中國人民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社會的深淵。帝國主義日趨嚴重的經濟侵略不僅影響到城市，而且深入到農村，逐漸瓦解了中國傳統的以農業與小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使越來越多的農民破產和失業。直隸、山東和沿海地區原本是棉花和蠶絲的生產地，自從煙臺關為通商口岸後，由此而輸入的洋紗成倍增長，致使周圍地區的土紗紡織幾乎全部破產，大批手工業者失去了生計，衣食無依。列強在中國修築的鐵路，使成千上萬從事肩挑販運的勞動者失去了飯碗。再加上教會勢力遍佈鄉俚，某些不良傳教士恣意橫行，魚肉百姓，一些無賴教民仗勢欺人，激起了民憤，於是，山東、直隸的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自發地發動了反對教會的鬥爭。逐漸地，各方反抗鬥爭的細流匯聚到一起，終於形成了波瀾壯闊的、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夏季，在清政府的許可下，大隊的義和團員湧入北京城，攻打東、西交民港使館區和幾座一大主教堂。滕公柵欄墓地也遭到洗劫。墓碑被推倒，有的被砸斷，墓穴被挖開，屍骨被焚燒，其它建築也被毀壞。

義和團運動畢竟是一次帶有自發性的農民運動。它沒有科學的理論作指導，不能正確地區分帝國主義的侵略與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生產方式的不同；不能正確地區分外國侵略者，與在歷史上曾經作過對中國有益事情的諸如利瑪竇、費隱等外國

傳教士兩者之間的不同；不能正確區分那些挾洋人以自重、狐假虎威、為非作歹的“二毛子”，與一般的信教國人兩者之間的不同。毀壞死人的墳墓並不能減輕中國人民的苦難，殘殺中國的信教群眾也無損於外國侵略者一根汗毛。

不久，英、法、德、日、俄、美、意、奧等八國聯軍攻進北京，慈禧太后帶著光緒皇帝逃到西安，義和團運動被鎮壓下去。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9月，清政府與列強簽定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辛丑條約》的第四款規定：“大清國國家允定，在諸國被污瀆及挖掘各墳塋，建立滌垢雪侮之碑，由各國使館督建，並由中國國家付給估算各費銀兩。京師一帶，每處一萬兩。其建碑之墳塋，英國一處，法國五處，俄國一處。”<sup>(21)</sup>因為當時法國取得在中國的天主教保教權，因此滕公柵欄墓地屬於一處法國墳塋。

代表清政府處理善後的全權大臣奕訢，准內閣侍讀學士張翼與主教林懋德商辦具體事宜。俄國駐京參贊羅達諾夫斯齊克亦參與會商。後張翼另有任用，即由直隸布政使周馥和雲南鹽法道李毓森與教會接洽。周馥連日分往各處(墳塋)踏看。他在奏折中寫道：

閱法國塋地各碑，有順治、康熙年間湯若望、南懷仁供職欽天監有功，恩禮優渥，予謚賜葬。以後响力外臣，賜葬銀者甚多。今橫遭此亂，莫不仆碑破冢，實屬慘目。<sup>(22)</sup>

按照列強的要求，中國政府出銀一萬兩，重修了墓地。除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龍華民、徐日昇(Tomé Pereira)、索智能(Polycapus de Sousa)等六人的墓碑單獨立起外，包括費隱在內的其他七十七位傳教士的墓碑被嵌入新建的馬尾溝教堂外牆。根據列強的要求，清政府在各國使館的監督下還專門立一所謂“滌垢雪侮”而實際是銘刻侮辱的石碑。碑文寫道：

此處乃欽賜天主教歷代傳教士之塋地。光

耶穌會士費公之墓

費先生諱隱，號存誠，泰西熱爾瑪尼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於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入中國傳教。於康熙五十年辛卯欽召進京內廷供奉。卒於乾隆八年癸亥閏四月十二日，蒙欽賜帑銀貳百兩。在會五十五年，享壽七十歲。

拉丁文譯文

獻給至善至尊的天主。耶穌會費隱 (Erembert Fridelli) 神父日耳曼人，曾發四項誓願。一七〇五年來華，為榮耀天主教致力於各種服務，後於主曆一七四三年六月四日在北京魂歸上主，享年七十歲，在會五十五年。

費先生諱隱，號存誠，泰西熱爾瑪尼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於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入中國傳教於康熙五十年辛卯蒙欽召進京內廷供奉卒於乾隆八年癸亥閏四月十二日蒙欽賜帑銀貳百兩在會五十五年享壽七十歲

DOMI  
FEREMBERTI  
FRIDELLI I.  
GERMANUS IV VO  
T A PROFESSUS VE  
NI AD SINAS AN  
NO MDCCV UBI  
MILTIS PRO DEI  
GLORIA LABORI  
BUS PERFUNCT  
REKINI IN DOMI  
NO OBIIT DIE  
JUNII A. C.  
M. D. CC. XLIII  
ÆTATIS SUÆ  
LXX  
SOCIETATIS  
INITÆ  
LV.

緒二十六年拳匪肇亂，焚堂決墓，伐樹碎碑，踐為土平。迨議和之後，中國朝廷為已亡諸教士雪侮滌愆，特發帑銀一萬兩，重新修建，勒於貞碑，永為殷鑒。<sup>(23)</sup>

從那以後以“滕公柵欄”為中心的教會產業又進一步擴展了。新的教堂蓋了起來，那塊恣辱石被高高地砌在教堂的大門上方。在原來的育嬰堂的舊址上，蓋起了一座平面圖形似“口”字的建築，建立了法屬遣使會修道院，創辦了“文聲大修道院”(GRAND ST. VINCENT SEMINARY)。來自北京和華北地區的修士，在那裡攻讀哲學、神學，那裡成了培養中國籍司鐸的高等學府。

1910年，在教堂的正西修建一座平面圖形似“山”字的建築，原設在西安門真如鏡的法國聖母會總院遷至此地。聖母會在這幢樓中創辦了“私立上義師範學校”，後又增設了附屬小學。此外，在“山”字樓南建了葡萄酒廠，專門生產作彌撒用的葡萄酒。在整個滕公柵欄基地的四周，種上了大片的葡萄。

在1840年到1949年之間，“滕公柵欄”已逐漸發展成了一處以墓地為主，包括有教堂、神學院、教會學校等功能的、知名的天主教教會產業。葬入這處墓地的中外籍神父、修女，以及非神職的外國人也越來越多了。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初，外國教會在華的產業，被當作外國僑民的財產予以保留。後來，根據政府的法令，將這些產業逐步轉歸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所有。馬尾溝教堂和滕公柵欄墓地在解放初期基本依舊，教堂的宗教活動照常進行，文聲修道院停辦，教會小學改為公立小學。

但是，隨着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城市建設的發展，北京的西郊日漸繁華起來。在阜成門外僅二里的地方保留滕公柵欄這處墓地，已經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當時的主教李君武也意識到這一點，他感慨地說：“看來墓地也該搬家了。”

1954年，北京市委黨校開始籌建。北京市政府用西郊西北旺的一塊土地，闢為新的天主教墓地，

以換取這處地產；用十萬購買了山字形樓和口字形樓兩幢建築，安置了部份無業神職人員的生活。小學遷入附近的新址。酒廠遷至石景山區重建，即今北京葡萄酒廠。對於傳教士墓地的處理，黨校方面與北京天主教愛國會之間發生了意見分歧。黨校主張將所有墳墓全部遷走，而教會方面人士認為，應將利瑪竇等六至七位在國內外影響較大的傳教士的墓碑保留在原地，否則，一是會傷害信仰虔誠的教徒的感情；二是將影響對愛國進步的神職人員的團結教育工作；三是可能產生不利的國際影響。

有關人員為此直接請示了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處。據當時黨校負責基建的老同志回憶，是周恩來總理親自做出決定，將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三位尊重中國人民傳統習慣並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較大貢獻的耶穌會士的墓碑仍在原址保留，龍華民、徐日昇、索智能等三人的墓碑移至教堂後院。而其它傳教士和教民的遺骨及墓碑，則遷至海淀區西北旺鄉新闢的十六畝墓地內。當時遷走的墳墓一共有837個。原馬尾溝教堂不僅保留，而且還照常舉行宗教活動。而嵌在教堂外牆的七十七尊明清時代的傳教士墓碑（包括費隱的墓碑），也被留在黨校院內。

1966年，發生了眾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8月某日，一些無知而狂熱，到處“破四舊”、毀壞文物的學生闖進黨校校園，聲稱限三天必須拆毀利瑪竇等傳教士墓地。第三天，紅衛兵又來了。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黨校的一名工作人員建議，將利瑪竇等人的墓碑深埋。學生們認可了這一處理方法，就動手幹起來。他們在原來墓地的前方挖了三個一米多深的坑，用繩子將碑拉倒，用土埋了起來。幹了整整一天，學生們滿頭大汗但又心滿意足地走了。這樣，墓地雖然被平毀了，但三尊墓碑卻得到了保護。

1974年，經當時的北京市領導批准，原馬尾溝教堂被拆毀，從此原來嵌在教堂外牆的包括費隱墓碑在內的七十多尊傳教士墓碑，和那塊恣辱碑都散落在院中各處，有的墓碑就在那個時候下落不明瞭。

1976年10月，一場令人頭腦狂熱，理智喪失的

風暴終於結束了。

1978年9月，中國政府派許滌新先生率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代表團赴意大利參加“歐洲研究中國協會”舉行的會議，會後到威尼斯、羅馬等城市訪問。主人常常談到曾在中國介紹幾何學、天文學等西方科學做出過貢獻的他們民族的優秀兒子利瑪竇。在羅馬，代表團遇到了一位在利瑪竇故鄉的馬切拉塔（Macerata）大學裡講授中文的柯拉迪尼教授，他就是這次盛情邀請和熱情接待中國客人的意大利友人之一。柯拉迪尼教授對許滌新團長說：上半年，他與身為意大利政府交通部長和意中經濟文化交流協會會長的科隆博先生一道訪華時，瞭解到在北京市黨校院內的利瑪竇墓地已被平毀。他轉達了科隆博先生的一個願望，即按照意大利保存的這座墓碑的做製品，用大理石重新鐫刻一尊新碑，贈送給中國，重樹在原處，以表達對這位三百多年前終生致力於意中文化交流的先哲的紀念。

許滌新回國後，即向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寫了一份報告，匯報了上述情況，並且建議：“鑒於上述意大利學者和友好人士對利瑪竇墓的重視，擬請院部向中央建議，對利瑪竇的被平毀的墳墓，加以修復，保存中西學術交流的一個重要史蹟。是否有當，請考慮。”胡喬木閱後，隨即上報給李先念副主席，並注上“請審批，擬同意”六個字。

筆者多方尋覓，終於在北京民政局檔案室查閱到了這份報告的複印件。在報告的文眉間，不僅有李先念副主席圈閱的標記，而且，當時另外四位最高領導人華國峰、葉劍英、鄧小平、汪東興圈閱的標記也赫然其上。

得到了最高領導層全體的認可，中國社會科學院即於10月24日向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出一份題為“關於請修復意大利學者利瑪竇墓”的函件。函件的全文如下：

在我國元朝〔應為明朝〕，意大利學者利瑪竇來中國講學，後來死在中國，葬在北京現市委黨校院內。現在墓、碑均已平毀。今年九

月，我院副院長許滌新同志訪問意大利時，意柯拉迪尼教授反映，意交通部長科隆博今年上半年訪華得知利瑪竇墓已被平毀後，表示願意重新鐫刻一個墓碑，希望重新樹原處。考慮到利瑪竇曾對溝通中西文化作出過貢獻，因此許滌新同志回國後向中央建議，修復利瑪竇墓，並經華主席和四位副主席的批准。現將許滌新同志建議的批示的影印件附後，請批轉有關單位辦理。

鑒於當時的政治氣氛，報告有意將利瑪竇這位來中國傳教的意大利神父，說成是來中國講學的意大利學者。

當時任北京市委副書記的毛聯暉看到這一函件後，批示道：“立功同志閱，是否讓民政局主辦為好。”便將修復利瑪竇墓地的任務下達給了對歷史文物並不熟悉的北京市民政局。

在今天看來，修復一處古墓，樹立一尊石碑，是何等尋常的小事。然而在二十幾年前，它確實驚動了中國的全部最高領導者。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圈閱許滌新同志報告的時間在1978年10月的4日至24日之間，這恰恰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夕。通過對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中國正醞釀一場深刻的變革。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已經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尊重知識、尊重人材和開放國門、學習國際先進科學技術的內部講話。地火正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之下湧動，改革開放的春天就要到來了。

北京市民政局接到任務後，立即組織人力妣手準備，他們請文物處負責技術指導，於是吳夢麟女士又擔任了這項工作。她和她的同事們認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三人的墓一直是在一起的，此次應一並恢復為好。

首要的問題是尋找墓碑。吳夢麟在黨校房管人員的協助下挖出了“破四舊”時埋入地下的三位神父的墓碑。三尊原碑可用，這不能不說是不幸中的萬幸。時隔一年，耗資一萬，利瑪竇及湯若望、南懷仁三位外國傳教士墓地終於在原處基本上以原樣

修復完畢。兩三年後，這處明清傳教士墓地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1984年，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協助下，北京市委黨校出重資擴建了傳教士墓地。在利瑪竇等人墓地東側專闢一院，將包括費隱墓碑在內的原嵌在教堂外牆、後來散落在院中且保存完好的六十尊墓碑，以及那塊作為歷史見證的“愆辱碑”重又樹立起來。1992年，西城區文化局出資，將位於黨校南牆的原馬尾溝教堂的小石門移至利瑪竇墓地的南面。

到目前為止，作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的“明清傳教士墓地”共保留六十三名傳教士的墓碑。除來自奧地利的費隱之外，其他還有十四人來自葡萄牙，十一人來自意大利，六人來自德國，九人來自法國，以及比利時二人、捷克二人、瑞士二人、斯洛文尼亞一人及不明國籍者一人，另有十四人為中國籍教士。

這些墓碑，不僅銘記那些致力於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它們本身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產物。石碑的頂部有的是盤龍，有的是祥雲，這表示其墓主身份的不同等級。碑的底座有二龍戲珠、鶴、鹿圖案，這都是中國人心中富貴吉祥、長壽的象徵。碑上的十字架、IHS字樣以及拉丁文的碑文則是西方天主教和耶穌會的標誌。

近年來，隨其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滕公柵欄這處古老的墓地，作為一處啟迪人們繼往開來的所在，也愈益受到各界的關注，前來觀光、憑弔和進行學術考察的中外人士絡繹不絕。一些國家的元首和政府總理、外交部長等官員、外國駐華使節以及來華的學者、教授、宗教人士及旅遊者也紛紛來此參觀遊覽。有的遊客就憑其北京市旅遊地圖，找到這裡來參觀。

費隱，作為埋葬在柵欄墓地的唯一的奧地利人，於2001年3月3日終於等來了他的故鄉人——奧國駐華大使博天豪先生（Erich Buttenhauser）和薩爾茨堡大學副校長溫克琳娜女士（Brigitte Winklehner）的憑弔。

費隱並不是唯一的來華奧地利傳教士，也不算是最早來華的奧國人。在他之前，有1646年來華的

瞿安德（Andre-Xavier Koffler）、1659年來華的白乃心（Johann Grueber）和1660年來華的恩里格（Christian Herdtricht）；在他以後，有1707年來華的梅若翰（Jean-Baptist Messari）、1718年來華的金亮（Balthasar Miller）。<sup>(24)</sup>但是，祇有費隱具有在中國服務三十多年的豐富經歷，參與測繪《皇輿全覽圖》的宏偉工程，得到中國皇帝的獎賞；也祇有他死後安葬在北京的滕公柵欄墓地。作為18世紀中奧文化交流的使者，費隱為源遠流長的兩國人民的友誼作出了傑出的貢獻。雖然歷經了幾百年的風風雨雨，他的墓碑和經他手修建的聖若瑟教堂，至今保存基本完好，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2005年8月8日，將是費隱來華300週年的紀念日，讓我們共同來紀念他，把他開創的中奧友誼進一步發揚光大。

#### 【註】

- (1)(4) (美) George H. Dunne, S. J. *Generation of Giant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 P.11; P.13。
- (2)(3) (意) 柯毅林 (Gianni Criveller) 著，王志成等譯《晚明基督論》（*Preaching Christ in Late Ming China*），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頁12；頁13。
- (5)(10)(14)(15)(16) (法) 費賴之 (P. Louis Pfister, S. J.) 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995年版，頁618；頁618；頁619；頁619。
- (6)(8) (美) T. N. Foss *Jesuit Cartography a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 見澳門文化司署編輯出的 *The Jesuits 1594-1994, Macao and China, East meets West*, P.133; 133。
- (7)(9)(12)(13) 方豪著《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華書局1988年版，（中）頁298；頁300；頁301；頁301。
- (11) 《大清聖祖皇帝聖訓》卷五，轉引自許明龍編《中西文化交流先驅》，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頁129。
- (17) 據黃時鑒教授考證，在西堂建成之前，現在的南堂，因位於東堂以西，故當時曾稱為西堂。
- (18) 洪大容〈湛軒燕記〉，轉引自黃時鑒《東西交流史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頁416-418。
- (19) 孫殿起輯、雷孟水編《北京風俗雜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頁24。
- (20) 高智瑜、林華、余三樂、鍾志勇編《歷史遺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頁75；頁17。
- (21) 梁為楫等編《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選編與介紹》，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出版，頁429。
- (22) 國家檔案局明清歷史檔案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頁1075。
- (24) 見費賴之著《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270、325、360、627；及（法）榮振華（Joseph Dehergne, S. J.）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中華書局，1995年版，頁436。



天地為物推一真主造天以蓋造地以拱  
 享之要其在世小心其罪孽敬奉之行善道

天主以下人愛之恩父母惟大其已去世真罰隨之或上  
 或下未木迎來孝子慈願設牌或像非以棲魂乃以記

敬真主  
 天地位物  
 生於 卒於 年 月 日  
 氏聖名  
 生於 卒於 年 月 日  
 氏聖名

一通清代耶穌會墓碑拓本